

约束与包容：流动人口司法治理的 差异性研究^{*}

王翔 胡悦^{**}

【摘要】对流动人口犯罪依法进行审判,是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亦是保障流动人口有序治理的重要防线。本文聚焦流动人口司法裁判问题,基于164790份裁判文书数据展开系统分析,从裁判差异角度实证考察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策略与运作机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呈现出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并存的双重倾向:相较于本地人口犯罪,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判决刑期量刑更严,约束性更强;但同时,司法判决又受当地经济和文化两大维度影响,对司法约束性形成非线性调节。两种效应共同塑造了流动人口司法治理力度,为规范流动人口有序发展构建了法治化空间。准确把握这两种司法效应,有助于为完善我国流动人口犯罪防控体系提供更为坚实的经验支撑。

【关键词】流动人口;法政治学;裁判文书;语言距离;经济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问题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治理发展过程中需要攻克的重要课题,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经济不平等的经济与治理认知塑造机制与行为政策引导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72374116)、司法部2024年度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青年课题“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治理效能研究”(项目批准号:24SFB3006)、南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青年交叉研究项目“大数据时代的民主参与机制变迁:基于陪审制度的法政治学分析”、南开大学“百名青年学科带头人培养计划”的资助。

^{**} 王翔,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悦(通信作者),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聘副教授, yuehu@tsinghua.edu.cn。

引文格式:王翔,胡悦. 2026. 约束与包容:流动人口司法治理的差异性研究[J]. 公共管理评论, 8(1): 174-199.

Cite this article: Wang X, Hu Y. 2026. Constraint and inclusion: Variations in the judicial governance of migrants [J].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8(1): 174-199. (in Chinese)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处于流动人口状态(聂日明和潘泽瀚,2022)。而在我国刑事犯罪中,跨区域流窜作案已占50%以上,沿海地区更是高达80%以上(任文岱,2017)。高犯罪率、高逮捕率、高羁押率的流动人口犯罪已然对地区稳定和流动人口有序管理、良性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常红和李警锐,2014)。在这方面,地方治理主体已开展了双轨制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基于新“枫桥经验”的基层治理创新,以及党建引领下社区治理优化等可贵探索,并取得了重要成绩。学者也从路径机制等多方面对这些探索进行了理论提升(王浦劬和汤彬,2020;宋世明和黄振威,2023)。相较而言,针对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这类“兜底性”治理措施的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

从社会治理角度,司法裁判作为一种公平正义的保障机制,既能修复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行为,又能向潜在犯罪行为传递法律威慑信号。司法裁判是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体现方式,同时也深刻反映了一个社会实现有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然而,相关研究长期受研究资源有限性、焦点多维性和学科隔离性等多重因素制约,对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作用和效力并未开展系统深入考察。但另一方面,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司法治理已步入深化改革前沿领域。在此背景下,大量法社会学、法政治学研究方法被引入司法社会治理效能研究中,例如,环境治理领域研究指出,环保法庭在我国各地广泛建立,有效提升了地区环境污染纠纷司法处理水平,增强了当地环境污染治理能力(范子英和赵仁杰,2019)。又如知识产权治理领域,知识产权法院通过提升纠纷解决效率并输出规范资源,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发展(陈天昊和苏亦坡,2023)。再如民主治理领域,人民陪审员制度为普通公民提供了制度化参与渠道,提升了民主治理效能(王翔和于晓虹,2023)。反观流动人口治理领域,关于司法治理角色的探讨却尚待深化。相关研究阙如,造成学界对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方式、影响效度和社会效应认知模糊,进而可能引发实践中不当治理、过度治理等问题。法院作为司法治理的主要执行者,对流动人口犯罪所采取的宽严取向和裁判偏好,都会深刻影响本地流动人口的发展生态,塑造着城市人口发展的政策走向。凡此种种均在呼唤学界进一步探索司法之于流动人口的治理逻辑,以更好地理解其机制和影响,从而为制定更公正、更有效的政策提供支持。

本文以“司法裁判差异”为突破口,对流动人口司法治理效果和机制进行系统分析。如果将司法裁判视为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理性决策,那么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诸多超越法律范畴因素的影响,因此司法决策须在裁判结果多样性和一致性之间达成动态平衡。尤其在量刑宽严取向上,司法决策通常对“外来者”(outsider)展现出两种极化裁判效应:一是约束效应,即出于对本地社区安全的担忧,往往被视为异质的“他者”施加更加严格的裁判手段,以此凸显法律的强大约束性。二是包容效应,即在考量文化差异、社会发展等多重因素基础上,司法决策会采取灵活策略,在处理“外来者”时倾向于采用更为宽容的判决,凸显法律的灵活包容性。在本文研究中,约束性和包容性交相互作用而产生共生效应,两者之间的强弱关系和相对位置,

直接影响并塑造着司法治理的具体行为和模式。如果说传统“被动司法”恪守着对法律条文的尊重,体现着司法的强制性和约束性;那么新时代司法治理则呈现出对社会治理情境的反思,彰显出司法的适应性和包容性。这两种情境通常会在漫长的改革过程中长期并存,且在本文所探讨的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叙事中有机融合。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以流动人口犯罪为研究对象,基于大规模司法裁判文书数据,从裁判差异视角实证考察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的策略及其内在运作机制。研究基于既有理论,试图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司法治理能否针对流动人口犯罪高发现实,通过能动手段形成有别于本地人口犯罪判决的司法约束?其二,在流动人口犯罪治理过程中,司法能否结合文化差异或城市发展需求,灵活调整约束性措施,从而在维持社会秩序的同时,实现更具包容性的治理?约束性与包容性是本文检验治理效果的核心,亦为司法治理的题中之义。

二、文献回顾: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已知与未知

流动人口犯罪治理是重要的社会议题,既有研究多聚焦犯罪动因与防治,对居住状态、分配制度和文化距离等因素予以关注,但对治理主体,尤其是法院如何参与治理的研究相对不足。事实上,法院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审判不仅是兜底性治理手段,更体现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动角色,这种主体性源于司法权力扩张中的社会职能延伸。少量实证研究表明,法院在判决中可能对流动人口采取更严厉的处罚,呈现出“本地人”与“外来者”的裁量差异,这一差异揭示了司法治理的复杂性,也是理解其治理效能的关键切口。

(一) 流动人口与犯罪治理

当前学界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研究,重在识别影响流动人口犯罪的潜在因素,聚焦流动人口是否及为何犯罪的问题,但并未特别关注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方式和效果。相关研究普遍认为,大规模人口流动是导致犯罪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王同益, 2016)。对于流动人口犯罪原因,相关研究大体有四个方向的解释。第一,居住状态。流动人口一般居住在出租屋,居住环境相对复杂,在这类空间实施犯罪相对容易,同时也易被侵犯(程建新, 2014)。人口流动性与租住率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居住状态等因素起作用(程建新等, 2016)。第二,分配制度。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低端”流动人口犯罪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地区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流动人口犯罪率的重要因素(史晋川和吴兴杰, 2010),最低工资上调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降低用工积极性,导致大量低技能外来流动人口失业,犯罪率由此上升(张丹丹等, 2018)。歧视性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政策会使农民工更加脆弱,更易陷入犯罪困境(章元等, 2011)。第三,文化距离。有研究表明,文化距离会提升流动人口加入同乡团伙犯罪的概率,文化差异对流动人口同乡团伙犯罪的影响通过同群效应实现

(章平和许哲玮, 2022)。第四,社会控制。流动人口犯罪数量上升与社会控制弱化有关,具体表现在公安和司法机关的犯罪控制力量未能有效保障,基层组织和用人单位的犯罪防控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王剑波, 2018)。

上述研究聚焦流动人口犯罪的形成机理和演变规律,为犯罪预防与控制提供思路与理论依据,但对治理主体(尤其是司法机关)在犯罪治理过程中作用的探讨却相对薄弱。其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数据获取的局限性。司法机关内部运作与决策相对封闭,这种封闭性反映在严格的信息管理和层级化权限中,研究者很难获取与司法决策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任勇和杨帆, 2020)。第二,犯罪治理的复合性。犯罪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司法的作用往往被视为其中一部分而非主要焦点,导致学界对司法治理效能研究相对不足。这种“治理主体”视角缺位,造成了学界对法律在流动人口犯罪预防和打击中的作用方向和机制方面缺乏深入探析。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司法大数据和计算社会科学前沿方法开展覆盖式研究,系统考察流动人口犯罪治理效果的多层次差异,为厘清差异成因、指导治理资源合理配置,精准突破犯罪治理瓶颈提供实证借鉴。研究将聚焦流动人口犯罪的司法治理维度,以该维度的核心裁判者——地区法院,及基础治理手段——刑事判决为切入点,系统考察司法决策之于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影响。

(二) 司法治理中的流动人口犯罪治理

法院在流动人口犯罪治理过程中成为关键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司法权力地位决定的。一般而言,法院通常被视为适用法律规范、解决纠纷与化解冲突的专门机构。随着社会发展及法院机构的日臻完善,法院的职能范围逐渐拓展,开始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司法的能动性也随之不断增强。不少研究默认,流动人口治理是城市治理与社会治安的衍生产物,司法至多被视为治理成果的一种呈现,而非兜底性治理手段,进而导致学界对这一治理手段在各维度的特征与差异性缺乏系统研究。事实上,对犯罪行为进行司法裁量,是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的主要方式。然而,法院往往须在遵循法律规范与考量社会影响之间权衡,进而形成差异化的裁量结果。在流动人口犯罪的司法裁量过程中,法院须平衡一系列案外因素:城市发展与治安稳定的摩擦、平等原则与社区保护的冲突、本地利益与外来权益的博弈。此类复杂问题都会在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中汇合,由此形成了差异化的司法判决取向。然而,当前学界研究并未全面系统地探讨“外来者”与“本地人”在刑事裁判量刑过程中的差异程度及其背后的潜在考量因素。受限于研究资源,既有研究对这种差异的感知,很大程度上源于经验判断或逻辑演绎,缺失可靠的大样本实证研究支撑。当然,近年来已有少数研究开始关注这一量刑差异,比如 Jiang and Kuang(2018)的实证研究显示,从农村流向城市的流动人口被告,可能会在刑事司法中处于劣势地位。另有研究指出,该差异是城市社会控制网络的结构产物(Lu and Drass, 2002)。这些探索性研究也提示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向:司法作为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有效工

具,在治理方式和作用程度上存在着一定差异,厘清该类差异有助于学界更深入地理解和应对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此,理解流动人口犯罪裁判差异,成为认知司法手段在该领域治理成效的关键。

三、理论假设: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的“约束”与“包容”逻辑

“司法治理”代表了对司法决策过程的一种深度解读,司法裁判不再局限于维护法律规范内部的一致性,还须对法外情境展开系统性权衡。司法治理倡导对法律的动态诠释与灵活适配,尤其是在处理受多重法外因素影响、性质复杂的情境时,司法裁判须将这些外源因素纳入裁量依据,裁判结果的差异化由此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解释这种差异性方面,焦点关注理论(focal concerns theory)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启发。自 Steffensmeier et al. (1998)首次将该理论引入刑事处罚领域以来,其已成为解释裁判量刑差异的主流理论。具体而言,Steffensmeier et al. (1998)提出法官决策深受三大焦点因素影响:(1)罪犯的应受谴责性和受害者的被伤害程度;(2)对社区的保护;(3)量刑决定可能带来的实际影响(如罪犯是否会服判)。作者将这一过程描述为“归因”(attributions),即该理论有助于识别影响法官作出量刑决策的实质性因素,而这三大焦点因素常相互交织,最终导致量刑结果的差异。此后,学界逐渐形成共识性研究设计路径,即以判决结果(刑期长度、监禁决定)为结果变量,以各种人口统计学变量为预测变量,探究变量间的共变趋势,本研究设计亦遵循这一分析范式,因而与主流研究框架具有一致性。

在上述影响因素中,学界讨论最多、与本文核心关切最契合的是“对社区的保护”。出于对“社区的保护”,罪犯的“可挽救性”(salvageability)成为优先考量因素。“可挽救性”强调既要关注犯罪者的矫正需求和个体特征、评估再犯风险,亦须兼顾社会经济地位、就业情况、可用的社会支持、文化距离等非法律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影响刑事司法判决的宽严尺度(Galvin and Ulmer, 2022)。这一逻辑置于本研究情境中,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裁量,亦是基于“对社区的保护”的考量过程,并由此在刑事裁量上衍生出两种可能效应:一是约束效应,由于流动人口是影响犯罪率的重要社会因素,出于维护本地社区治安的需求,相较于本地人口犯罪,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惩治约束效应更强;二是包容效应,当流动人口与本地文化差异越小,且城市发展对流动人口需求度越高时,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包容效应可能越强。本文理论框架见图 1。

(一) 司法决策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效应”

本文所讨论的约束效应,主要指司法系统在同类案件中可能会对流动人口实施更为严格的裁量标准——在同类案件中,流动人口可能会面临更长的刑期判决。从司法治理的角度出发,对该效应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理论进路:第一,专项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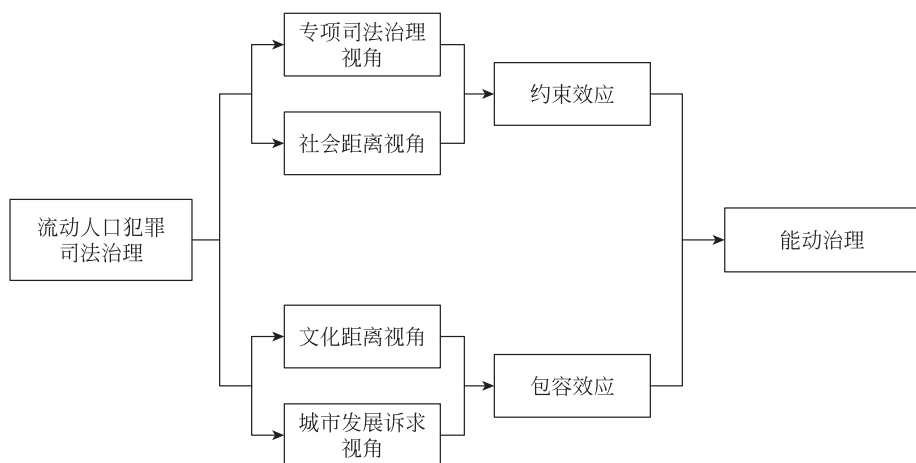


图1 本文的理论图示

来源:作者自制。

治理视角认为,法律应适配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劳东燕,2016)。流动人口因缺乏固定居所与稳定社会关系,不仅迁移频繁、身份难以追踪,增加治理成本,且更易被边缘化并走向犯罪,最终承受更大社会谴责(Wu and Treiman, 2004)。第二,社会距离视角认为,司法约束程度与群体所处的社会距离密切相关。社会距离可从地域、语言、阶层等维度衡量,距离中心群体越远,其越易成为司法关注对象,这不仅源于其法律资源获取不足、违法风险更高,也因其流动性强、社会关联弱(Blalock, 1967)。为维护秩序,司法机构往往对这类群体施加更强管控,已有研究在农民工犯罪治理中验证了该效应(Jiang and Kuang, 2018; 王剑波, 2018)。总之,流动人口作为外来的“他者”,在司法治理过程中往往被视为重点关注对象。出于本地社区稳定需求,司法部门可能会对流动人口采取相对严格的治理措施(Ryo, 2013)。部分研究探讨了司法在本地人口和外来人口犯罪案件中的判决差异,揭示了地方性偏好的存在(陈刚和孙艳倪, 2022; 才国伟等, 2024)。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理论假设:

假设1:相较于本地人口而言,司法治理会更加关注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约束,同类案件判决刑期会更长。

(二) 司法决策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效应”

如果说约束效应是司法部门对社会稳定责任的专门反应,那么包容效应便是其对社会发展责任的能动作用。从目前学界研究来看,司法决策对流动人口的包容性包含两个维度。一是文化包容性,这主要建立在“文化相似性”假设之上,即流动人口被告与当地文化的亲近程度直接影响司法裁判宽严取向。二是发展包容性,其主要建立在“发展优先性”假设之上,基于地区经济发展诉求,为吸引更多流动人口劳动力,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裁判可能相对宽松。从文化角度而言,流动人口与本

地文化的差异程度,直接影响着司法决策的宽严尺度。已有实证研究也提供了支持性证据,法官在司法决策时会考量被告的社会文化背景,当法官面对文化距离较近的被告时,往往倾向于采取相对宽松的裁量标准。在比较研究中,以种族、性别为界分的文化差异是学界重点关注的领域。实证研究表明,种族与文化会成为影响检察官量刑决策的重要因素(Hartley et al., 2007)。由此可见,当事人与本地文化的亲疏,是司法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既有研究通常从三个层面解读这一现象。一是社会认同维度,该视角认为个体通常会更认同与自身相似的群体(Hogg and Terry, 2000),若流动人口文化身份与当地文化接近,便更易被当地社会接纳与认同,司法也可能对其采取宽松裁量。二是诉讼资源维度,该视角认为社会网络是人们获取资源和支持的关键渠道,流动人口与当地文化距离越近,越易构建本地社会网络,这些社会网络可助其获取更多资源支持,进而提升胜诉可能性(田燕梅等, 2021)。三是文化心理维度,相关研究认为过远文化距离会导致法官产生文化认知偏差:既可能无法理解被告行为的文化背景和动机,也可能错误解读被告的行为和态度,同时可能对外来群体产生不信任感与偏见(Sagiv, 2015)。

文化距离对判决刑期的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刘毓芸等, 2015)。以语言维度为例,以方言距离为测度的文化距离对劳动力流动呈现出“倒 U 形”影响。当方言距离未超某一临界值时,不同方言会促进劳动力流动;一旦超过该临界值,不同方言则将阻碍劳动力流动(刘毓芸等, 2015)。据此逻辑,司法对流动人口判决的严宽程度也可能呈非线性的“倒 U 形”趋势。当流动人口与当地司法人员的文化背景相近时,司法可能因文化认同感增强而作出较为严格的判决,以维护法律秩序与社会一致性。反之,当文化差异过大时,司法判决可能反映出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根据社会认同理论,面对文化差异时,司法可能通过宽容判决缓解文化冲突,减轻误解,以维持社会秩序和稳定。根据这一逻辑,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 对于流动人口的约束性司法治理会受到基于文化距离的包容效果调节,呈现对近距离约束性增强、远距离约束性减弱的“倒 U 形”趋势。

包容效应不仅可能源于文化维度,也可能出自发展考量。流动人口既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支撑。流动人口作为重要的经济资源,为流入地提供了增量劳动力资源,精准匹配城市经济发展用工需求,促进了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余玲铮等, 2022);同时,流动人口数量增加,也给地方消费市场注入活力。因此,流动人口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往往会左右着司法决策的方向。尤其当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增加流动人口时,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司法裁量可能表现出相对宽松的倾向。贝克提出的经典理论框架为此提供了阐释依据:个体犯罪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理性决策,是权衡预期收益与成本的过程。相应地,司法决策也是在公共福利和惩治成本之间寻找平衡(Becker, 1968)。在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吸引流动人口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司法决策可能倾向于通过降低犯罪的社会成本,减少对流动人口的法律约束,进而对待流动人口犯罪行为采取更为宽松的裁量方式,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3: 对于流动人口的约束性司法治理会受到基于发展诉求的包容效果调节,对于发展中国家包容性大,但对于大型城市这种包容性则减弱,总体呈现“U 形”趋势。

四、研究设计

本文在司法裁判文书基础上,整合方言数据、地方统计年鉴数据及疫情数据等信息,旨在分析司法对流动人口量刑的裁判差异。首先,研究利用全样本数据检验流动人口身份是否影响司法判决结果,以此检验司法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效应(假设 1)。随后,单独提取流动人口样本,重点检验司法是否以及在何种情境下对流动人口产生包容效应(假设 2、3)。最后,借助全样本数据验证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是否相互作用,进而考察两种效应在不同流动人口类型和不同案件类型中产生的影响。

(一) 研究数据

本研究核心数据来自中国裁判文书网。研究采用计算机辅助文本分析技术,从 2020—2021 年全国基层法院审理的一审刑事案件中抽取样本,并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对文书类型和案件类型进行自动分类与标注。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案件中的情节要素进行了批量识别,确保数据精准提取。在案由划分和案件情节的处理上,研究采用机器学习方法,以提升分类及要素识别的效率。在识别文书中的流动人口信息时,因涉及较为明确的身份信息提取,未依赖机器学习技术,而是通过基于规则的文本匹配与过滤方法实现自动化识别。

在抽样策略上,研究首先以研究时段内全国公开的刑事裁判文书为母体,按案件类型、文书类型及量刑情节分层,识别出 16 种常见且样本基数较大的案件类型,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其次,仅保留司法判决书,排除裁定书、决定书等其他类型。再次,为便于分析裁判差异,研究聚焦判决结果为有期徒刑的案件,因其罪行相对较重、裁量空间较大,也符合主流研究惯例(Hou and Truex, 2022)。最后,剔除信息缺失较多、异常或重复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64790 份,覆盖 31 个省份、282 个地级市。为验证数据质量,研究随机抽取 6000 份样本进行人工标注与机器比对,结果显示准确率 89.5%,召回率 85.3%,F1 值 0.873。

需要说明的是,司法裁判文书公开的限度,尤其自 2021 年以来裁判文书公开率有所下降,可能对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基于大数据的计算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面临的挑战。然而,本研究谨慎认为,该因素对本文结论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涵盖三个方面。其一,在案件类型选择上,研究刻意规避了可能未公开的案件类型(如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犯罪),转而选取相对普通、常规且敏感度较低的案件。一方面因前者数据难以获取,另一方面其并非流动人口犯罪治理的主要议题。其二,本研究对象流动人口并非社会敏感群体,案件当事人的流动人口身份通

常不会成为该案件是否公开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公开案例在逻辑上相较其他犯罪类型会更为全面。其三,结合前期多家法院调研发现,裁判文书公开偏差多由技术因素导致,对本研究考察的裁判差异问题影响相对间接。

为考察文化差异对司法裁判的影响,研究在裁判文书数据基础上整合了方言数据。以方言距离度量文化差异是语言政治学、语言经济学的常用方法,语言不仅是传递信息和交流的工具,更是表达和理解文化现象的载体,而方言作为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既承载着身份认同、归属感及群体互动等社会心理机制,也折射出特定地区的文化特征和价值观(Hu and Pizzi, 2022)。在方言距离构建上,参考许宝华和宫田一郎编著的《汉语方言大辞典》对方言的层级划分——由粗略到细致依次为“汉语”“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本研究以方言片作为衡量文化差异的指标。

研究对案件类型与流动人口犯罪数量进行了交叉分析,如图 2 所示,盗窃罪和诈骗罪案件中,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显著多于本地人口。这一结果符合常识判断,流动人口通常缺乏深厚的社会关系与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易陷入经济困境,进而更可能参与盗窃和诈骗等犯罪活动。当然,部分案件类型中本地人口犯罪要比流动人口犯罪更为突出,如交通肇事罪、故意伤害罪等,这主要是由于本地人可能会更多参与日常生活相关活动,一方面,本地人更熟悉当地道路和交通规则,可能更易引发交通事故或违规行为;另一方面,一些故意伤害罪案件可能多与本地人间的争执、冲突有关,这源于其更紧密的社交网络和亲密关系。同时,为便于后文异质性分析,研究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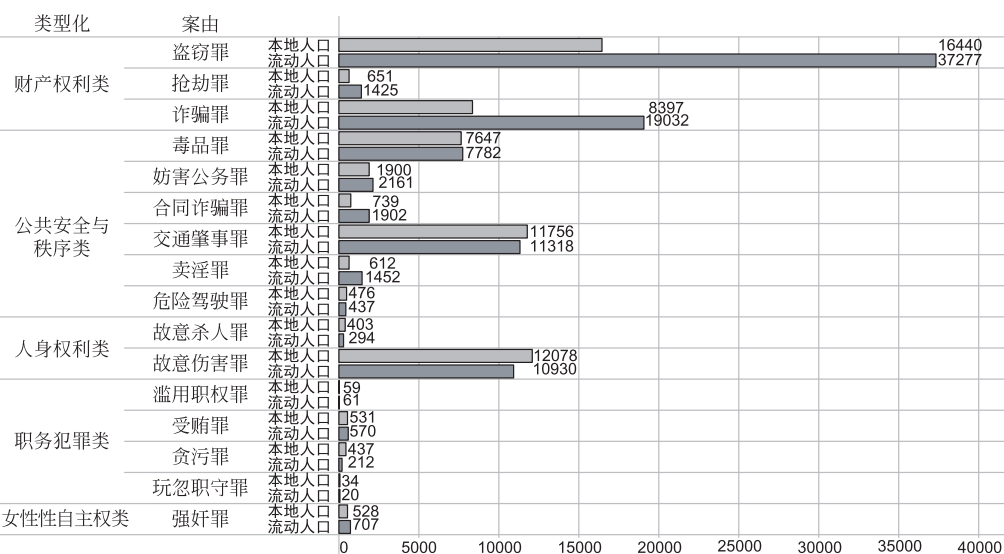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案件类型中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数量分布^①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2021。

① 为了作图简洁,“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在图中简称“毒品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在图中简称“卖淫罪”。

据刑法分则一类案由、犯罪所侵犯法益及研究侧重,将 16 类案由类型化为五种类型,分别是财产权利类、公共安全与秩序类、人身权利类、职务犯罪类、女性性自主权类(见图 2)。

流动人口犯罪程度可能受到本地流动人口规模影响。图 3 显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流动人口犯罪活动更为活跃,其犯罪数量明显高于本地人口犯罪;但在中小城市,本地人口犯罪数量略高于流动人口。这也符合基本认知规律,规模越大的城市,经济活动越繁荣,社会资源越丰富,对流动人口劳动力的需求也越旺盛,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大城市,会给当地社会治安环境带来冲击;加之大城市竞争相对激烈,流动人口缺乏社会支持,更易通过非法途径满足自身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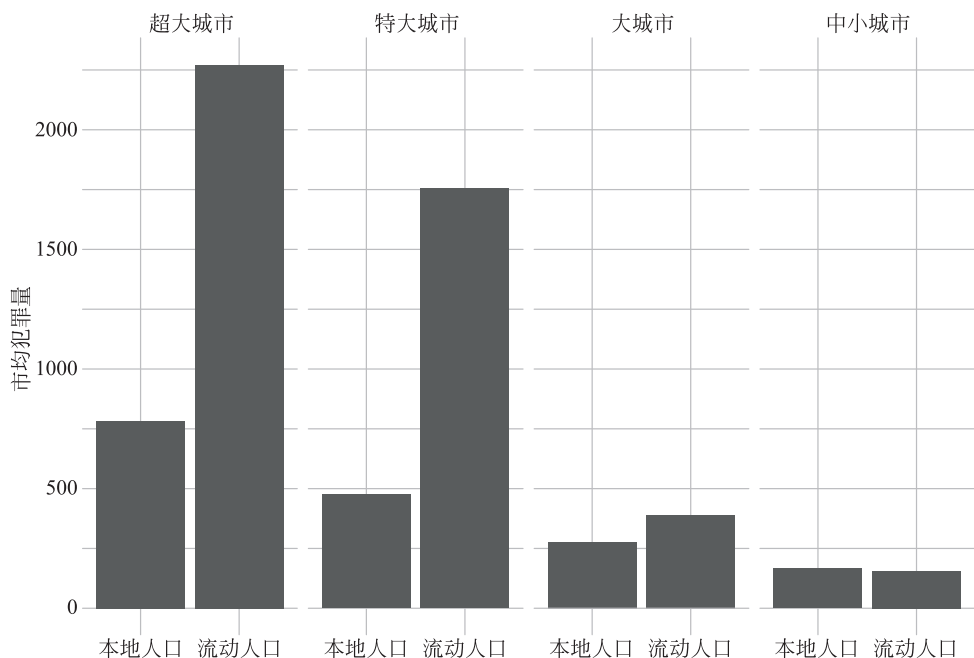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城市类型中的平均犯罪量^①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2021。

(二) 变量度量

本文核心结果变量为判决刑期。以刑期衡量法院的裁判偏好、裁判差异及宽严尺度,是目前学界通行做法(Hou and Truex, 2022),可通过刑期长短变化观测法院对流动人口的裁判倾向。为便于比较分析,研究统一将刑期单位换算为月。图 4 横轴代表判决刑期,纵轴代表对应案件数量。总体来看,大部分案件执行刑期都在 50 个月以内,对流动人口的判决刑期总体上略高于本地人口。

^① 为了作图简洁清晰,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我们将 I 型小城市、II 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合并归类为“中小城市”,I 型大城市、II 型大城市合并归类为“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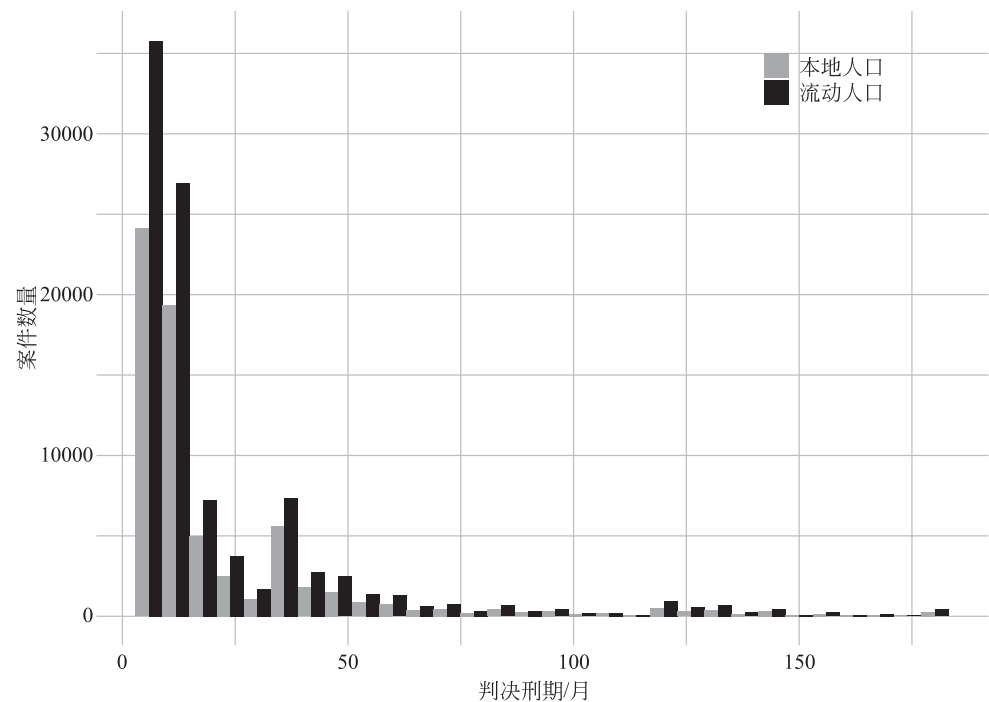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刑期所对应的案件数量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2021。

基于理论架构,本研究针对判决刑期的差异性设置了三个解释变量。其中,用于测量约束效应的解释变量为流动人口身份。研究利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对裁判文书中被告犯罪信息进行检索处理。如果被告户籍地和犯罪地分属于不同地区,则该被告属于流动人口,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该测量方式参考了章平和许哲玮(2022)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受限于裁判文书数据的特性,研究无法获取“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这类更细致的居住时长信息,因而难以对“流动人口”进行严格界定。同时,研究主要侧重于探讨流动人口的文化距离及发展诉求对司法判决的影响,而上述特征因素在现实社会治理中往往超越了流动人口的严格定义,据此,研究审慎认为,采用宽泛方式界定流动人口并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测量包容效应的解释变量有两个:其一,文化距离。借鉴既有研究,本文以方言距离为变量测量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文化距离(刘毓芸等,2015;章平和许哲玮,2022)。计算公式如下:

$$d(A,B)=\sum_{i=1}^I\sum_{j=1}^JS_{Ai}\times S_{Bj}\times d_{ij}\tag{1}$$

公式中, S_{Ai} 为A市中*i*县的人口比例, S_{Bj} 为B市中*j*县的人口比例, d_{ij} 为两县的方言距离。求得方言距离 $d(A,B)$ 表示任意一名A市居民与任意一名B市居民之间方言距离的期望。借鉴刘毓芸等(2015)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数

据计算得到各地级市内各县人口比例,并用公式(1)加权测算得到两两地级市之间的方言距离。研究先计算县与县之间的方言距离,当两县同属一个方言片,距离赋值为0;同一方言区但不同方言片,距离赋值为1;同一方言大区但不同方言区,距离赋值为2;同一语族但不同方言大区,距离赋值为3;同语系但不同语族,距离赋值为4。^①鉴于方言距离可能会产生非线性影响,研究同时将方言距离二次项纳入回归方程。

其二,发展诉求,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经典的经济集聚理论(economies of agglomeration)认为城市规模的增大会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活跃,外来人口的发展诉求随之增加(Marshall, 1890)。后续实证研究也基于这一理论验证了城市规模的扩大能有效反映外来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Borjas, 2003)。据此,本文以城市人口数量作为发展诉求测量方式,并根据《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7级(I型小城市、II型小城市、中等城市、I型大城市、II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并依次编码为1~7,以此量化发展诉求度。研究同时将其二次项纳入回归方程中。文化距离与城市发展诉求样本密度见图5。为更有效捕捉其非线性趋势,后文将对发展诉求变量进行指数变换,以放大其原始数值中的微小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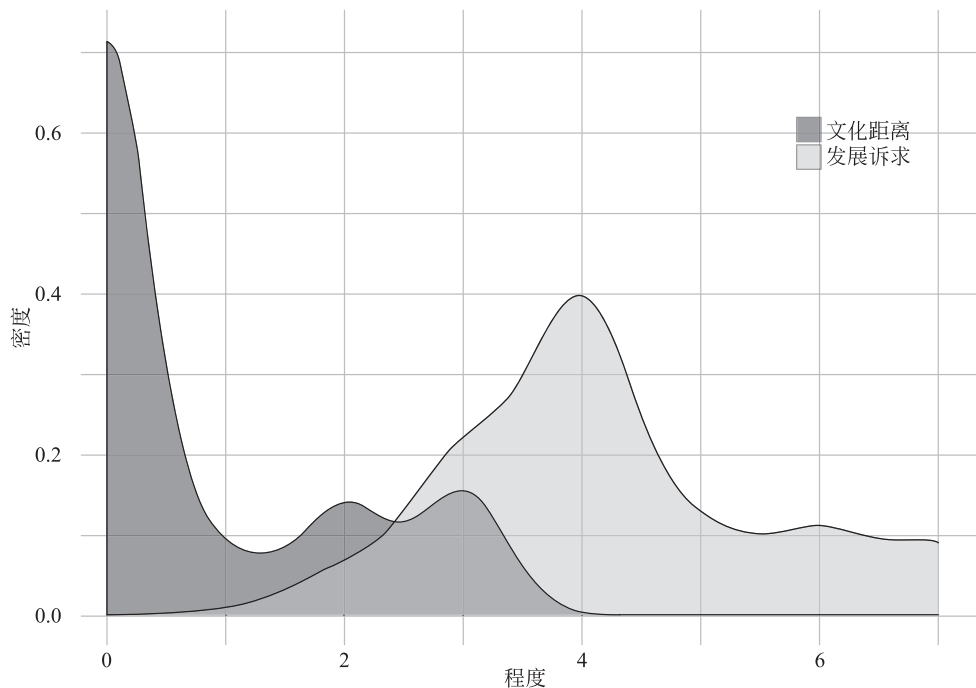


图5 文化距离与发展诉求的样本密度分布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① 该方法综合方言的语言学特征、地理因素、历史因素等,对其相似性进行量化赋值。其对语言距离的测量有效性已经获得了语言经济学、语言政治学大量研究的支持(Fearon and Laitin, 2008; Laitin and Ramachandran, 2016)。同时在操作层面,这一方法也被广泛应用于流动人口研究中,方法和成果获得学界认可(刘毓芸等, 2015; Hu and Pizzi, 2022)。

在控制变量方面,研究控制“案内因素”和“案外因素”两个方面;在“案内因素”方面,如何排除外生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是基于裁判文书数据的实证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刑事案件的定罪与量刑情节相对复杂,尤其当样本涵盖多种类型案由,找到各类案由中“共有”“均一”的控制情节便尤为重要。这一领域的法律实证研究普遍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则情节和最高人民法院 2021 年发布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作为选取控制变量的重要依据,因此,本研究将刑法总则情节和刑法量刑情节中诸要素纳入“案内因素”控制变量。同时,研究还控制了 16 类案件类型,具体包括盗窃罪,抢劫罪,诈骗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妨害公务罪,合同诈骗罪,交通肇事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危险驾驶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滥用职权罪,受贿罪,贪污罪,玩忽职守罪,强奸罪。

在“案外因素”方面,本文在数据可得范围内选取了如下变量。(1)社会经济层面,即人均 GDP、地方财政年度预算,数据均来源于地方统计年鉴。(2)社会保障层面,即失业人数、社会保险参保数量,数据均来源于地方统计年鉴。这些因素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犯罪率,也是量刑决策中需要考量的重要维度。(3)疫情冲击层面,考虑到样本期内覆盖新冠疫情时期,各地政府实施的差异化防控措施,可能影响流动人口的流动频率,同时其特殊管理措施可能会对司法资源配置和审判流程产生干扰,因此须对疫情因素加以控制。具体而言,本研究控制了各年度各城市新冠累计确诊病例数的加总,数据统计结果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方网站。(4)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考虑到判决刑期可能受时间差异、地域差异及认罪认罚从宽等动态政策的影响,本研究将年份虚拟变量和城市虚拟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 与表 2。

表 1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部分)

变量名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判决刑期/月	164790	23.334	29.09	6	180
是否流动人口	164790	0.594	0.491	0	1
文化距离	164790	0.750	1.141	0	4
发展诉求	164790	4.242	1.356	1	7
案外因素					
人均 GDP(取对数)	164790	11.02	0.574	9.384	12.28
失业人口数量(取对数)	164790	10.51	0.980	7.225	12.52
政府财政预算(取对数)	164790	15.68	1.027	12.40	18.05
社会保险(取对数)	164790	13.54	1.332	8.294	16.21
疫情严重程度(取对数)	164790	2.923	2.317	0	10.83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表 2 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离散变量部分)

变量名		频数/件	占比/%
刑法总则情节			
罪过形式	犯罪过失=1	21426	13.00
	犯罪故意=0	143364	87.00
犯罪形态	犯罪既遂=1	158010	95.89
	犯罪未遂=0	6780	4.11
阻却事由 ^①	是=1	48	0.03
	否=0	164742	99.97
共同犯罪	是=1	29013	17.61
	否=0	135777	82.39
单位犯罪	是=1	18985	11.52
	否=0	145805	88.48
精神病	是=1	1232	0.75
	否=0	163558	99.25
盲聋哑	是=1	8213	4.98
	否=0	156577	95.02
量刑情节			
自首	是=1	90660	55.02
	否=0	74130	44.98
坦白	是=1	51235	31.09
	否=0	113555	68.91
立功	是=1	6840	4.15
	否=0	157950	95.85
当庭自愿认罪	是=1	100087	60.74
	否=0	64703	39.26
退赃退赔	是=1	66948	40.63
	否=0	97842	59.37
主动取得被害人谅解	是=1	56856	34.50
	否=0	107934	65.50
与被害人和解	是=1	11604	7.04
	否=0	153186	92.96
累犯	是=1	36391	22.08
	否=0	128399	77.92

① 阻却事由主要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正当防卫,二是紧急避险。案件中如果出现任何一种情形,记为1,否则为0。

续表			
变量名		频数/件	占比/%
前科	是=1	46513	28. 23
	否=0	118277	71. 77
未成年	是=1	7675	4. 66
	否=0	157115	95. 34
老年犯	是=1	270	0. 16
	否=0	164520	99. 84
残疾犯	是=1	10045	6. 10
	否=0	154745	93. 90
审判时怀孕或流产	是=1	18608	11. 29
	否=0	146182	88. 71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2020—2021。

五、检验结果

考虑到结果变量的连续性特征,研究主要采用时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时间维度控制年份差异,空间维度控制城市差异。由于控制变量数量相对较多,受篇幅所限,为突出文章主线,控制变量未一一列举,这一处理方式亦符合社会科学的通行研究规范。

图 6 旨在检验司法对流动人口是否具有约束作用(对应假设 1)。该图通过点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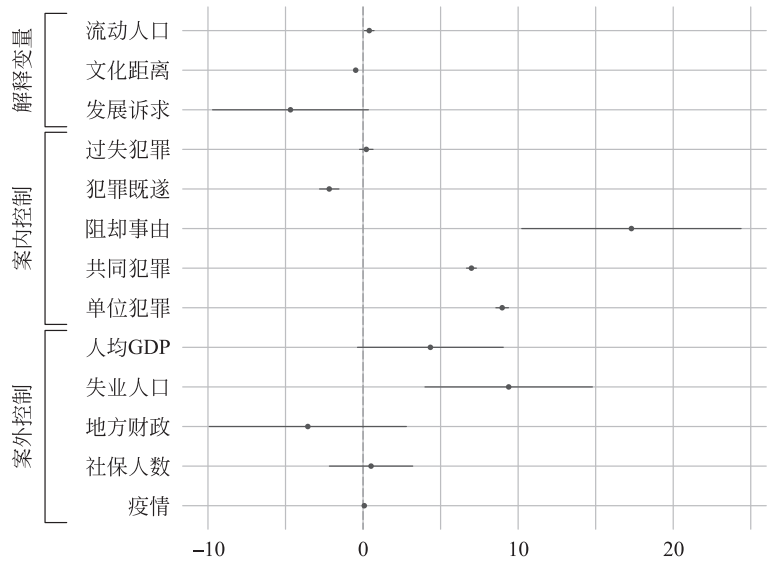


图 6 司法对流动人口的裁判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图方式对回归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图中圆点代表回归系数,横线为 95%置信区间,垂直虚线为零线。仅当置信区间与零线不相交,变量作用才视为在 0.05 水平上统计显著。其中,核心解释变量为“是否流动人口”,结果显示,流动人口被告显著正向影响判决刑期的严格程度。这意味着,相较于本地人口而言,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判决刑期更长($\beta=0.34, p<0.05$)。这种影响效应在控制案内因素、案外因素及时间、城市固定效应之后依然稳健,这初步表明,相较于本地人口而言,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强度更高,体现了法律适用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效应。

为考察司法是否针对流动人口群体产生“包容效应”(对应假设 2、3),研究单独提取流动人口样本,以刑期为因变量,以文化距离与发展诉求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文化距离一次项显著为正($\beta=1.15, p<0.01$),二次项显著为负($\beta=-0.61, p<0.01$),意味着流动人口文化距离对判决刑期的影响呈先增后减的倒 U 形特征。发展诉求一次项显著为负($\beta=-1.28, p<0.01$),二次项显著为正($\beta=0.09, p<0.05$),说明城市发展诉求对判决刑期的影响呈先减后增的 U 形特征。

为直观呈现文化距离对判决刑期的非线性影响,研究绘制了边际效应图(图 7)。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的影响在取值约为 1 处出现拐点,即当文化距离跨越“同一方言区不同方言片”后,司法约束显著增强,但随着文化距离继续扩大,约束效应减弱,包容性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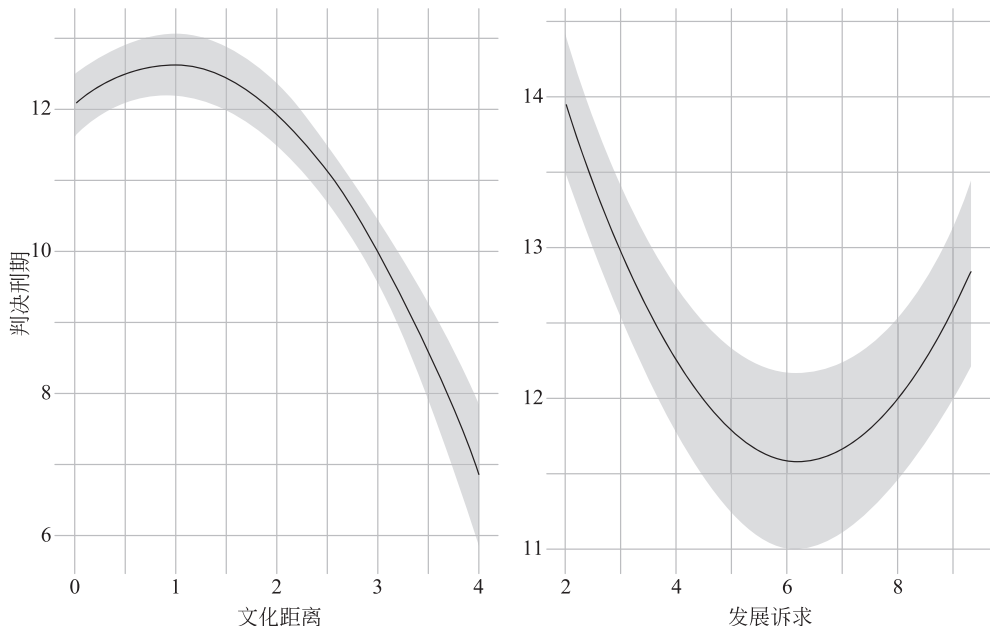


图 7 文化距离与发展诉求对判决刑期影响的非线性趋势

注:图中阴影部分代表 95%置信区间,模型中已控制案内因素及当地人均 GDP、失业人口数量、地方财政、社会保险人数、疫情严重程度等案外因素,并使用了时间-地区双重固定效应。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该拐点大致位于方言区边界,反映出方言区内文化认同度较高、社会规范更一致,法院更易施加严格法律约束;而跨越方言区后,因文化与语言差异显著,司法裁判须兼顾文化尊重与语言沟通,裁判态度更趋宽容,体现出司法治理在平衡文化多样性与法律秩序之间的主动调适。发展诉求在城市等级为 6(特大城市)时出现临界点。临界点之前,城市发展诉求越强,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约束越弱,刑期越短,反映出中小城市及大城市因对外来劳动力需求较高、社会秩序压力较小,司法表现出较强的包容性。临界点之后,即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约束作用增强,刑期逐渐延长,说明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即便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提升,但社会管理压力同步上升,司法治理趋于收紧。这一拐点标志着城市发展诉求与社会秩序维护在司法裁量中的权衡达成新的平衡,也是司法约束从弱转强、刑期由短变长的转折点。

为探究约束效应与包容效应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本文引入流动人口与发展诉求、流动人口与文化距离的交乘项,绘制二者对判决刑期影响的边际效应图(见图 8)。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与文化距离的交乘项并不显著($\beta=0.88, p=0.83$),但总体趋势是流动人口文化距离越远,判决刑期也会越长。而流动人口与发展诉求的交乘项显著负向影响刑期($\beta=-0.002, p<0.01$),表明发展诉求的包容效应能调节司法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效应,当城市发展诉求较高时,流动人口身份对刑期的影响可能相对减弱,由此证明约束效应与包容效应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司法裁判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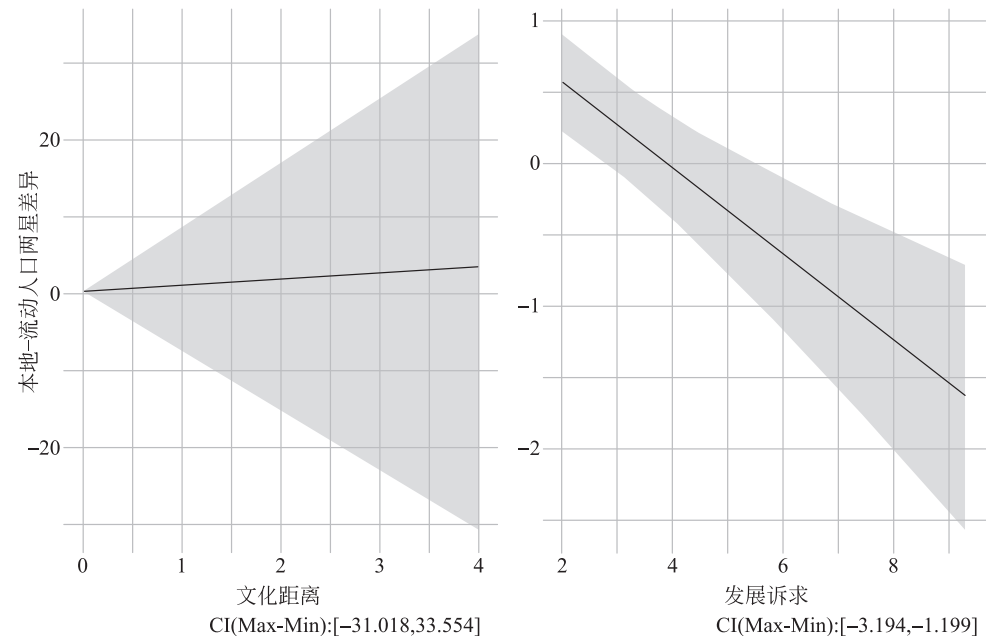


图 8 流动人口与文化距离、发展诉求的交互影响

注:图中阴影部分代表 95%置信区间,模型中已控制案内因素及当地人均 GDP、失业人口数量、地方财政、社会保险人数、疫情严重程度等案外因素,并使用了时间-地区双重固定效应。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一般而言,流动人口根据迁徙范围可分为跨省、跨市与跨县流动人口。那么,不同迁徙范围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包容效应?为此,本文借鉴刘毓芸等(2015)的研究,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见图9)。对于跨县流动人口犯罪,文化距离与发展诉求(含二次项)对判决刑期均无显著影响,符合预期。此类人口迁徙距离较近,与流入地文化差异较小,且流入地的城市发展吸引力也相对有限,因此司法裁判未呈现明显差异。对于跨市流动人口犯罪,文化距离对判决刑期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显著为负,表明文化距离适中时可能引发更严厉处罚;发展诉求一次项显著为负,二次项虽为正向但未达显著性水平,表明在较高城市发展诉求场景下,司法相对包容,但包容性会随诉求上升而减弱。对于跨省流动人口犯罪,文化距离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为负但未达统计显著性水平,表明文化差异越大,司法判决越趋严格,以强化处罚维持秩序;发展诉求一次项显著为正、二次项为负但未达统计显著性水平,说明尽管流动人口对城市发展具有吸引力,但考虑其潜在再犯风险,法院判决更趋严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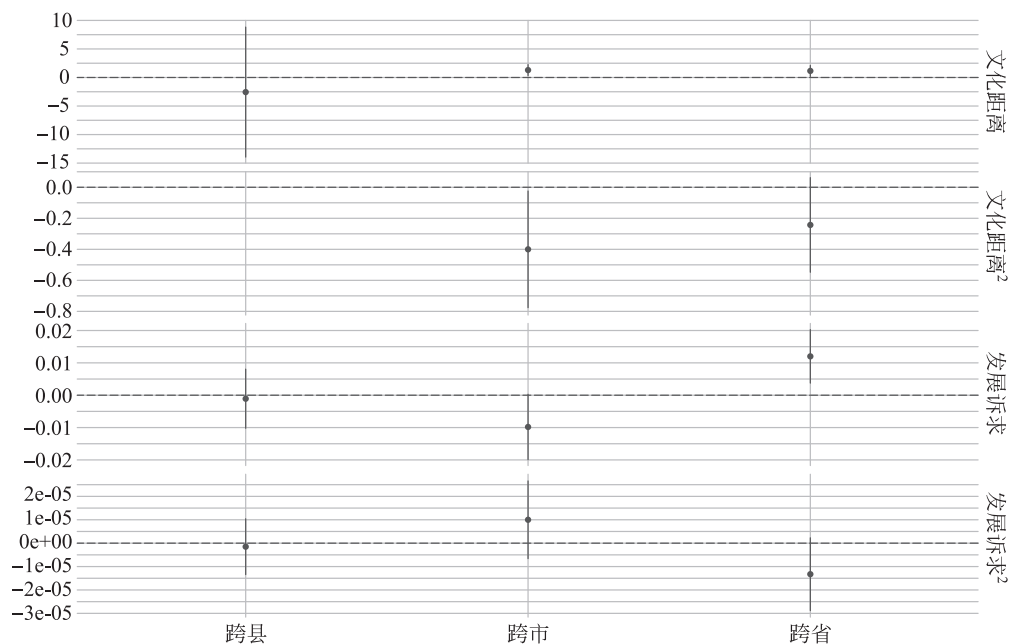


图9 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对司法判决的影响(跨县、跨市、跨省)

注:图中点代表回归系数,线段代表95%置信区间;模型中已控制案内因素以及当地人均GDP、失业人口数量、地方财政、社会保险人数、疫情严重程度等案外因素,并使用了时间-地区双重固定效应。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为进一步考察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对司法判决的影响,本文按案件大类分组检验,结果如图10所示,二者的影响方向在各类案件中大体保持一致。文化距离及其二次项在公共安全与秩序类中对判决刑期具有显著影响,呈倒U形特征。类似地,

发展诉求在公共安全与秩序、财产权利类中对判决结果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 U 形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含二次项)在职务犯罪及女性性自主权类犯罪中的影响均不显著,可能因前者涉及政治责任和公共信任,后者更关注行为本身及其对受害者的伤害,故相关变量作用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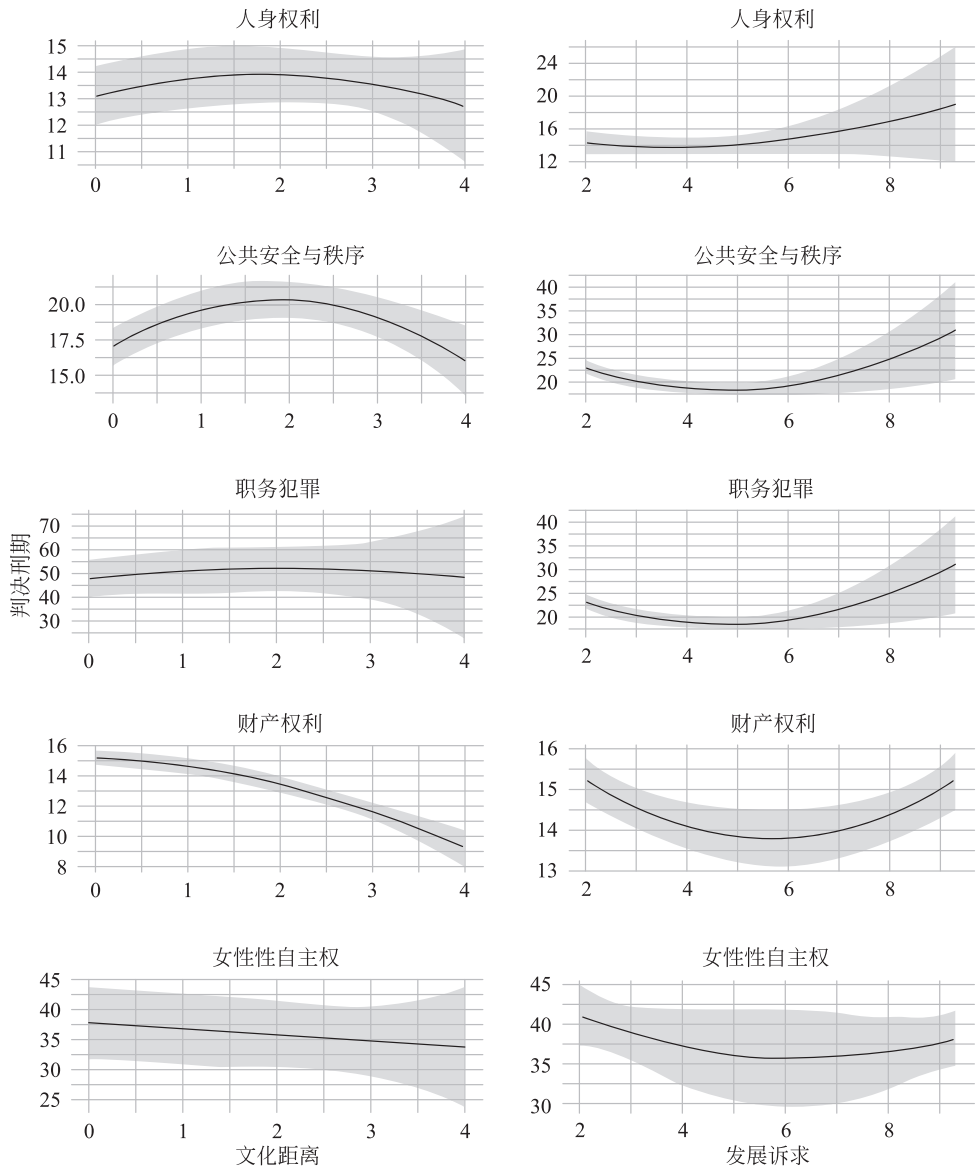


图 10 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对司法判决影响的边际效应图(区分案件类型)

注:图中阴影部分代表 95%置信区间,模型中已控制案内因素及当地人均 GDP、失业人口数量、地方财政、社会保险人数、疫情严重程度等案外因素,并使用了时间-地区双重固定效应。
来源:作者自行整合数据。

六、总结与讨论

作为拥有庞大流动人口规模的国家,我国流动人口治理有效性不仅关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效能,更影响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落地成效。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国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给社会治安与治理带来了新挑战。本文以流动人口犯罪为研究对象,基于 164790 件裁判文书数据,整合方言距离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及疫情相关数据,从司法治理视角,探究司法对于流动人口犯罪的裁判倾向,聚焦司法治理中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的作用机制及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的模式、特征与逻辑。

结合理论建构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研究发现。第一,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存在一定约束效应。该效应主要表现在司法对本地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的裁判差异——相较于本地人口犯罪,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判决刑期更长。第二,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存在一定包容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文化距离对流动人口判决刑期的影响呈先增后减的倒 U 形趋势。第三,司法对流动人口犯罪的约束效应与包容效应相互共生、相互作用。研究通过建构文化距离和发展诉求的交互项验证二者关系,发现城市发展诉求能调节司法对流动人口的约束效应。这种约束与包容的共生现象揭示了司法在“依法施治”与“因势而变”之间达成的微妙动态平衡。第四,文化距离与发展诉求对判决刑期的影响在不同类型流动人口与案件类型中呈现明显差异。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潜在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司法在面对不同文化背景 and 经济发展阶段时,如何通过裁判回应社会治理需求,具体研究贡献可归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为理解流动人口治理提供了司法治理的理论视角。流动人口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多个层次与维度,本文重点关注了常被学界忽视的司法治理维度,指出司法在流动人口治理中的作用不止于依法审判具体犯罪行为,更承载着国家在流动人口政策上的目标指向和路径考量。而司法治理的意义也寓于具体鲜活判例之中,这些判例的累积为学界理解流动人口政策提供了鲜活的分析素材和动态视角,清晰展现了司法决策对流动人口政策执行的塑造与影响,同时也揭示了法律制度在应对流动人口问题时潜藏的张力和调适空间。同时,司法治理视角为学界理解和分析社会治理多样性提供了有益启示:司法不仅是定分止争的工具,更是维护秩序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第二,本文揭示了司法决策差异背后的潜在动因。研究结果印证了法院并非简单依据法律条文作出裁决,而是在综合考虑多种案外因素(人均 GDP、失业人口数量、政府财政预算、社会保险、疫情严重程度)基础上形成差异化判决结果(Dyevre, 2010)。法官在司法决策过程中可能根据不同的情形,对流动人口犯罪行为策略性地作出从宽或从严判决。法院会对“外来者”施加相对严格审判,这种差异化裁判实

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有社区的秩序和安全。同时,司法决策也是一个理性选择过程,并非机械严厉地对待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文化距离、城市发展对流动人口的需求程度等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决策的结果。本文认为,不能简单将这种差异化判决归咎为司法不公正,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司法治理面临的复杂处境,整合并调适着司法决策所依据的环境变量,展示着司法参与社会治理的弹性抉择和审慎态度。

第三,本文重构了“司法包容性”的理论内涵。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大背景下,流动人口作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其文化特质、经济需求乃至犯罪行为,均已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文化分歧引发的冲突变得更为常见。本文所讨论的“司法包容性”实则构建了跨文化理解与和解的思路——司法决策不应仅强调“照章办事”,更应关注犯罪背后的文化差异与经济诉求,并在法律判断与社会治理中体现这种理解和尊重。“司法包容性”实际上是对社会复杂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理论重构,它并非对犯罪行为的“纵容”,而是对社会多元性的潜在观照,是在法律和社会之间寻求平衡的重要实践。

诚然,本研究仍存在可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本文初步揭示了司法治理流动人口的决策倾向及裁判结果中呈现的约束效应和包容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治理的司法研究维度,然而此类司法决策背后的作用机制,未来仍须结合更多微观行为数据与定性资料开展更深入的探索。第二,受研究数据限制,本文的发现基于特殊时期(疫情冲击),审慎推断,司法治理的包容效应和约束效应在非特殊时期可能更加显著。期待后续研究在获得新数据后对本研究进行复现,以揭示效应的动态变化特征。第三,本研究仅限于对有期徒刑案件的分析,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理论边界,将流动人口犯罪司法治理的逻辑延伸至管制、拘役等其他类型的案件中,以获得更全面的认知。第四,受数据可得性(如数据的保密性或不可公开性)限制,本文难以全面考察立案、侦查、起诉等司法诉讼前置环节,这些阶段可能对流动人口犯罪采取差异化的包容与约束策略,我们也期待后续研究能结合更全面的数据进行系统性探讨。

参考文献

- 才国伟,陈思含,李兵. 2024. 本地偏好与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来自中国交通事故裁判文书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4(6): 1729-1745.
- Cai G W, Chen S H, Li B. 2024. Local bias and the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Evidence from the judgment documents of Chinese traffic accidents[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4(6): 1729-1745. (in Chinese)
- 常红,李警锐. (2014-08-18). 报告:中国 18-29 岁农民工犯罪比例最高[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18/c1002-25488734.html>.
- Chang H, Li J R. (2014-08-18). Report: The crime rate among migrant workers aged 18-29 in China is the highest[EB/OL].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18/>

- c1002-25488734. html. (in Chinese)
- 陈刚, 孙艳倪. 2022. 司法中的“乡愁”——法官是否偏爱老乡[J]. 中国经济问题, (6): 82-98.
- Chen G, Sun Y N. 2022. The nostalgia in judicature: Does judges favor ‘Lao Xiang’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Studies*, (6): 82-98. (in Chinese)
- 陈天昊, 苏亦坡. 2023. 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治理实效与制度逻辑[J]. 法学研究, 45(1): 179-204.
- Chen T H, Su Y P. 2023.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nd institutional logic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in China[J]. *Chinese Journal of Law*, 45(1): 179-204. (in Chinese)
- 程建新. 2014. 流动人口弱势空间与犯罪——对广东省东莞市的实证分析[J]. 南方人口, 29(2): 11-17.
- Cheng J X. 2014. Vulnerable space and criminal behavio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Dongguan [J]. *South China Population*, 29(2): 11-17. (in Chinese)
- 程建新, 刘军强, 王军. 2016. 人口流动、居住模式与地区间犯罪率差异[J]. 社会学研究, 31(3): 218-241, 246.
- Cheng J X, Liu J Q, Wang J. 2016. Domestic immigration, residential status and crime rates[J]. *Sociological Studies*, 31(3): 218-241, 246. (in Chinese)
- 范子英, 赵仁杰. 2019. 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 ——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J]. 经济研究, 54(3): 21-37.
- Fan Z Y, Zhao R J. 2019. Does rule of law promote pollution control? Evidence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urt[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4(3): 21-37. (in Chinese)
- 劳东燕. 2016. 能动司法与功能主义的刑法解释论[J]. 法学家, (6): 13-28, 175.
- Lao D Y. 2016. Judicial activism and the functionalism theory of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in criminal law[J]. *The Jurist*, (6): 13-28, 175. (in Chinese)
- 刘毓芸, 徐现祥, 肖泽凯. 2015. 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形模式[J]. 经济研究, 50(10): 134-146, 162.
- Liu Y Y, Xu X Y, Xiao Z K. 2015. The pattern of labor cross-dialects migration[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0(10): 134-146, 162. (in Chinese)
- 聂日明, 潘泽瀚. (2022-07-22). 中国人的流动: 七普数据大透视[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14109.
- Nie R M, Pan Z H. (2022-07-22). The mobility of the Chinese peopl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Data [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114109. (in Chinese)
- 任文岱. 2017-06-22(06). 张荆: 要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创造条件[N]. 民主与法制时报.

- Ren W D. 2017-06-22(06). Zhang Jing: Conditions should be created for the integra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s into cities[N]. Democracy and Legal System Times. (in Chinese)
- 任勇, 杨帆. 2020. 流动人口数据采集中的结构性困境及其化解——基于 G 市和 H 市的案例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10): 60-66.
- Ren Y, Yang F. 2020. The structural dilemma in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management: Cases from city G and city H[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10): 60-66. (in Chinese)
- 史晋川, 吴兴杰. 2010. 我国地区收入差距、流动人口与刑事犯罪率的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0(1): 73-84.
- Shi J C, Wu X J. 2010.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s regional income inequality,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criminal offense rate [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0(1): 73-84. (in Chinese)
- 宋世明, 黄振威. 2023. 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J]. 管理世界, 39(1): 28-40.
- Song S M, Haung Z W. 2023. Carrying on and developing the “Fengqiao Model” of the new era in promoting primary-level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9(1): 28-40. (in Chinese)
- 田燕梅, 徐恺岳, 魏建. 2021. 法院判决的影响因素——当事人资源与诉讼能力的中介效应[J]. 清华法学, 15(5): 163-176.
- Tian Y M, Xu K Y, Wei J. 2021. Factors influencing court decisions: The medium effect of two parties' resources and capacity in lawsuits[J]. *Tsinghua University Law Journal*, 15(5): 163-176. (in Chinese)
- 王剑波. 2018. “城市梦”下的北京市流动人口犯罪的治理[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56-157.
- Wang J B. 2018. Beijing under the Urban Dream: Governanc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crime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156-157. (in Chinese)
- 王浦劬, 汤彬. 2020. 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塑造机制研究——基于 T 市 B 区社区党组织治理经验的分析[J]. 管理世界, 36(6): 106-119.
- Wang P Q, Tang B. 2020.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shaping governance authority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 analysis based on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community party organizations in area B of city T[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6(6): 106-119. (in Chinese)
- 王同益. 2016. 外来人口、户籍制度与刑事犯罪[J]. 人口研究, 40(2): 63-74.
- Wang T Y. 2016. Immigrants, hukou system and criminal offense [J]. *Population Research*, 40(2): 63-74. (in Chinese)
- 王翔, 于晓虹. 2023. 人民陪审员参审效能的实证分析——基于 36 万余份刑事判决书的

- 司法大数据考察[J]. 法学家, (3): 30-44, 191.
- Wang X, Yu X H. 2023.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erformance of people's assessors in adjudication: Analyzing judicial big data of 360000 criminal judgments[J]. *The Jurist*, (3): 30-44, 191. (in Chinese)
- 余玲铮, 刘欢, 魏下海. 2022. 移民多样性与城市经济发展[J]. 劳动经济研究, 10(2): 3-21.
- Yu L Z, Liu H, Wei X H. 2022. Immigrant diversity and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J]. *Studies in Labor Economics*, 10(2): 3-21. (in Chinese)
- 张丹丹, 李力行, 童晨. 2018. 最低工资、流动人口失业与犯罪[J]. 经济学(季刊), 17(3): 1035-1054.
- Zhang D D, Li L X, Tong C. 2018. Minimum wage, rural migrants' unemployment, and crime[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7(3): 1035-1054. (in Chinese)
- 章平, 许哲玮. 2022. 方言距离与城市流动人口犯罪的同群效应——基于广州、深圳、东莞三市的实证分析[J]. 社会, 42(5): 181-206.
- Zhang P, Xu Z W. 2022. Dialect distance and peer effect of crime among urban migran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uangzhou, Shenzhen, and Dongguan [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2(5): 181-206. (in Chinese)
- 章元, 刘时菁, 刘亮. 2011. 城乡收入差距、民工失业与中国犯罪率的上升[J]. 经济研究, 46(2): 59-72.
- Zhang Y, Liu S J, Liu L. 2011. Can we attribute increasing criminal rate to enlarging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6(2): 59-72. (in Chinese)
- Becker G S. 1968. Crime and punishment: An economic approach[M]//Fielding N G, Clarke A, Witt R. *The Economic Dimensions of Crim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3-68.
- Blalock H M. 1967. *Toward a theory of minority-group relations*[M]. New York: Wiley.
- Borjas G J. 2003. The labor demand curve is downward sloping: Re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labor marke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 1335-1374.
- Dyevre A. 2010. Unifying the field of comparative judicial politics: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judicial behaviour[J].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2): 297-327.
- Fearon J D, Laitin D D. 2008. Integrat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M]//Box-Steffensmeier J M, Brady H, Collier 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Method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31-460.
- Galvin M A, Ulmer J T. 2022. Expand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focal concerns: Alternative sentences, race, and "salvageability"[J]. *Justice Quarterly*, 39(6): 1332-1353.
- Hartley R D, Maddan S, Spohn C C. 2007.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 An examination of substantial assistance departures in federal crack-cocaine and powder-cocaine cases[J].

- Justice Quarterly*, 24(3): 382-407.
- Hogg M A, Terry D J. 2000. Social identity and self-categorization processes in organizational context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5(1): 121-140.
- Hou Y, Truex R. 2022. Ethnic discrimination in criminal sentencing in China[J].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84(4): 2294-2299.
- Hu Y, Pizzi E. 2022. Breaking through the language barrier: The role of language policy in migration decisions[J].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3): 23-51.
- Jiang J Z, Kuang K. 2018. Hukou status and sentencing in the wake of internal migration: The penalty effect of bei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J]. *Law & Policy*, 40(2): 196-215.
- Laitin D D, Ramachandran R. 2016. Language policy and human development[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0(3): 457-480.
- Lu H, Drass K A. 2002. Transience and the disposition of theft cases in China[J]. *Justice Quarterly*, 19(1): 69-96.
- Marshall A. 1890.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London: Macmillan and Company: 20-22.
- Ryo E. 2013. Deciding to cross: Norms and economics of unauthorized migration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8(4): 574-603.
- Sagiv M. 2015. Cultural bias in judicial decision making[J]. *Boston College Journal of Law & Social Justice*, 35(2): 229.
- Steffensmeier D, Ulmer J, Kramer J. 1998. The interaction of race, gender, and age in criminal sentencing: The punishment cost of being young, Black, and male [J]. *Criminology*, 36(4): 763-798.
- Wu X G, Treiman D J.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J]. *Demography*, 41(2): 363-384.

Constraint and Inclusion: Variations in the Judicial Governance of Migrants

WANG Xiang¹ HU Yue²

(1.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2.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judicial treatment of domestic migrants in China'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Despite extensive scholarship on migrant criminality, systematic analyses of judicial responses to migrant offenders remain underdeveloped. This research addresses this empirical gap by investigating sentencing patterns as a governance mechanism that reveals how Chinese courts operationalize competing imperatives of public-order maintenance and migrant incorporation.

Leveraging over 160000 criminal court judgments from basic-level courts (2020—2021), the study employs a novel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that uses *hukou*-crime location discrepancies to classify migrant defendants. Integrating granular data on linguistic distance and municip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research conducts a multi-level assessment of how cultural proximity and the local political economy affect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Th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first, that migrant defendants receive systematically longer sentences than local defendants for comparable offenses, even controlling for case-specific factors and jurisdic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entencing disparity demonstrates a consistent constraining function by which courts impose enhanced penalties on non-local offenders as a result of judicial responsiveness to social stability imperatives and perceived threats to community cohesion.

Second, cultural distance exhibits a non-linear moderating effect on sentencing severity. Migrants from linguistically similar regions face harsher penalties, while those from culturally distant areas receive comparatively more lenient treatment. This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indicates that judicial actors calibrate the intensity of punishment based on categorical boundaries between proximate “threatening insiders” and distant “non-threatening outsiders,” reflecting cognitive frameworks that shape the perceptions of social risk.

Third, the local economic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conditions the sentencing outcomes. In small, medium, and many large cities with robust labor demand for migrant workers, courts demonstrate greater leniency, revealing judicial accommodation due to economic dependence on migrant labor. Conversely, in mega-cities facing intensified governance pressures, sentencing severity increases markedly, reaffirming the judiciary’s social-control function under conditions of demographic density and administrative complexity.

These findings illuminate a dual logic of judicial governance wherein Chinese courts simultaneously constrain and incorporate migrants. This duality reveals that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transcends formal legal applications, incorporating implicit calculations about social boundaries, stability maintenance, and developmental priorities. These results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le of the judiciary in managing a highly mobile society and offer insights for improving crime governance by balancing public security with the long-term integration of migrants.

Keywords: migrants; law and politics; judicial documents; linguistic dist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投稿日期: 2024/12/2 送外审日期: 2024/12/16 首轮外审完成日期: 2025/1/6
录用日期: 2025/7/10 最终修回日期: 2025/12/5